

■ 说言晓论

小心经济波动成为慢性病

盛世危言之三



◎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政策与市场手段及行政政策之间的切换,希望连续加息直至通货膨胀预期趋于稳定,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强调启动人民币升值进程,提高汇率促进进口、扩大和拉动内需,改善贸易失衡。显然,要做到这一点,中央政府必须赋予央行在利率政策操作上的相对独立性,并明确货币政策目标为稳定物价水平。

与之对立的经济学界则断言经济运行中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风险。其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林教授认为物价指数低迷反映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状况并未消失,国内的不平衡会导致国际的不平衡,出口的巨额顺差是国内产能过剩的集中反映。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将面临多重两难选择: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常规方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更难摆脱产能过剩。可是,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银行会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将与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另外,产能过剩,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外贸出口和贸易顺差会增加,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上升。而人民币升值又会使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从而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趋严重。据此推理,林教授建议放弃经典的宏观调控办法,转而利用行政手段控制投资和信贷,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改革外资、外贸政策。

近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还通过投资回报率测算,指称中国当前的投资回报率非常低,由此证明投资并不高,也不过热。宋教授的这一看法与此前许小年教授通过增量资本产出效率的计算得出的投资已经过热并且不可持续的观点恰好形成截然相反的判断,从而引起普遍关注。

饶有兴味的是,两年多来没有哪种观点成为绝对的主流看法,甚至持某种观点的学者不经意间转变论调也不鲜见,由此影响到宏观调控政策的摇摆性,尤其是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以来频繁地改弦易张。2003年开始,央行采取了窗口指导,贷款规模控制各项行政措施以抑制经济局部过热。2005年,为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将超额准备金基准利率由1.62%下调到0.99%。然而,事隔4个月之后,因为汇率制度的改变,为防止外贸下降,触发通货紧缩,政府转而提出了加快货币供应的增长以及扩大内需的导向。不曾想,进入2006年,防范经济过热重成主调,政府又出台上调贷款上限的措施,并做出抑制银行信贷增长的态度。政策选择的摇摆性反映出政府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判断的困难以及调控的无所适从,“组合拳”逐渐变成了“迷踪拳”。

笔者认为,第一,中国当前的高投资与财政联邦主义与政府机会主义形成的权力与资本联盟有关,这一联盟的制度与政策效应就是,持续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排斥劳动分享利润,从而以压低工资率来换取高额资本回报。因此,用投资回报高难以证明投资合理。第二,中国当前的高投资导致的潜在通货膨胀危险是现实存在的危险,而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后引发大量供应增长进而导致新一轮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危机则是未来经济运行的风险,这里面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是交替的关系,进口增加,从而使得产能过剩的情形更趋严重。据此推理,林教授建议放弃经典的宏观调控办法,转而利用行政手段控制投资和信贷,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改革外资、外贸政策。

近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还通过投资回报率测算,指称中国当前的投

与当前中国经济投资过热现象同时并存的产能过剩,有人干脆将这种矛盾而复杂的状况称之为“中国精神分裂式的繁荣”,面对如此矛盾现状,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趋势究竟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及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含义争论不休。

判断控制投资过热,预防通货膨胀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实际通货膨胀大大高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等数据显示的幅度,原因之一在于煤、电、油、运等要素价格是管制的,而CPI指数中住房成本又被严重低估了,从经济运行的情况看实际上中国经济存在深层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较高的公众通胀预期。2005年中国的信贷GDP比率为136%,投资GDP比率为48.6%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这部分学者认为,投资过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利率政策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中国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导致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然而却保持着远低于国际水平的利率,流动性的泛滥因而风生水起。他们由此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主张货币

■ 边上人语

“免费午餐”有前提条件



◎ 胡飞雷
职业投资人 自由撰稿人
现居河南平顶山市

甚清晰的地方,情况就不一样了,某件财产,是张三的还是李四的,常常说不清、搞不明。在这些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白吃“免费午餐”的家伙,而且这些白吃的家伙还混得很滋润、很快乐,甚至很高尚、很伟大、很有面子,很让人艳羡眼红。

说这些地方存在着大量白吃的“免费午餐”的现象,不是否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经济学的思想学说。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学说具有普世价值,也不是否定某些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白吃“免费午餐”的现象。区别在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属于宏大叙事,是从整体上来评定事实的,而说某些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白吃现象,属于微小叙事,是从局部来认知事实的。从局部不能推翻整体,即使所有的局部都存在白吃饭的现象,也不足以从学理上整体上推翻“天下”,当然,若回到现实,如果所有的局部都存在白吃的现象,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与科学与和谐无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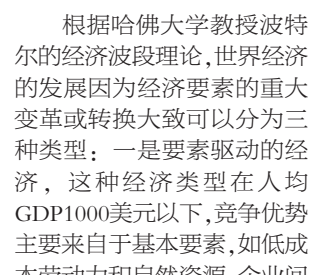
中国银联宣布实施针对跨行查询行为收费之后,受到了舆论强烈质疑。近日,中国银联正式正面回应舆论,说大家要树立有偿服务观念。中国银联这一回应的潜台词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回应有没有道理呢?实事求是地讲,在想来想去,想了好久,却想不出一个简洁、明确、肯定的答案。这不是一个简单易懂的问题。从整体上

讲,用宏大叙事的口气讲,中国银联让大伙树立有偿服务观念是有道理的,因为服务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有成本费用的,提供服务者收费,或者接受服务者付费,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若高小帐目下还没有都算进来——也许这是一本永远也算不尽、算不完、算不清的大账。而大账算不清,就无法界定跨行查询收费这个小事是否合理。

行文至此,可以做一下小结了:一,从整体宏观上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提供免费者,理应承担到补偿报酬;二,从局部微观上讲,天下确实存在白吃午餐(当然也包括早餐、晚餐、夜宵、早茶、零食)的现象,解决思路,应该着力创新法律制度,减少以至消除白吃者的可乘之机;三,吃“免费午餐”是有条件的,可以让白吃者在此局部吃,但必须在彼局部付费,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基于如整体效率、市场外部性等方面的考虑;四,在说不清是否白吃的情况下,可以交由市场和民间来鉴定,银联跨行查询收费即可如此对待。

而弗里德曼则不然。他80年代就来过中国,一直努力通过实践调查和真实历史数据来了解中国。他早年指导过的两个中国学生,后来均成了新中国金融货币理论的权威。一位是陈彪如,一位是陈观烈,堪称中国经济学界的“二陈”,与史学界二陈交相辉映。陈彪如先生翻译过一系列经济学

深圳自主创新的最短木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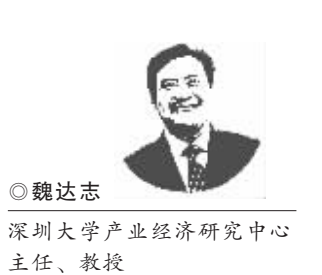
◎ 魏达志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根据哈佛大学教授波特的经济波段理论,世界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要素的重大变革或转换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要素驱动的经济,这种经济类型在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基本要素,如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二是投资驱动的经济,这种经济类型一般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间,生产效率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技术来源大都来自于技术许可、外国直接投资、合资企业和模仿,企业间的竞争主要依靠资本的投入和生产的效率;三是创新驱动的经济,这种经济类型一般在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企业能够推出创新的、处在全球经济前沿的产品,经济中存在强有力的、支持创新的制度和激励,产业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创新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

今天的深圳,城市和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正因为自然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水资源等一系列资源的限制而难以维系,面临着要素投入的方式转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巨大压力。

要实现两大转变,使自主创新将成为深圳市经济发展、支撑产业与产品全球竞争力的主要动力源,深圳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建立在资源型制造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科技革命时代则是建立在技术创新与技



◎ 魏达志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术进步的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之上,科技要素较之自然资源要素而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性资源,科技要素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它不服从价值规律、不服从稀缺规律、不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科技要素的优化组合,正以其强大动力推进整个人类社会知识创新、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前进步伐。

问题是,巨大规模和数量的科技要素从哪里来呢?最好的来源是城市的创新能力。因此,能否形成自主创新型城市,能否改变要素的投入方式,能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否具备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就成为能否在世界经济与科技全球化新的竞争时代中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对于深圳而言,这里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难题: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经济科技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单位发生了变化,这个基本单位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单个的企业,而是由各种现代产业、新兴产业的产业集群、产业关联所共享的现代中心城市和城

市群。而中心城市能否带动整个城市群发展的核心内涵就是中心城市能否成为创新中心,这是科技文明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核心问题。显然,在今天,整个珠江三角洲,还没有那个城市具有鲜明的创新中心城市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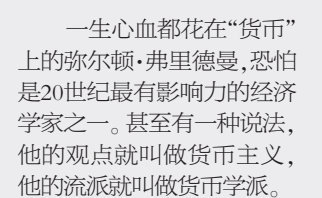
城市创新体系的构造离不开诸多子体系的建设,比如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的知识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中介机构为主体的技术扩散体系,还有培养创新人才的人才培育体系,有政府创新政策的政策导向体系,有情报交流、技术市场等综合性的技术服务体系,有提供风险投资支撑的金融保障体系,有建立创新氛围、创新环境的创新文化体系,有技术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创新实现体系等等……这么多子体系构成的创新体系均环环相扣、相互依托,而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必须依托这些子体系。因此,完善城市创新体系是支撑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和环境基础,而城市创新体系是否完善又是检阅自主创新能力能否形成的最佳理论和方式。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不妨细问:深圳城市创新体系中最重要和最薄弱环节是什么?如果没有优质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的支撑,要想发展成为自主创新型城市是无法设想的,想成为区域性创新中心的难度就更高了。

如果深圳想在未来时代有所作为的话,无论如何应该更多地注意发展行为中的长远方式。

■ 识小录

弗里德曼与中国货币问题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之一



◎ 梁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专栏作者

一生心血都花在“货币”上的弥尔顿·弗里德曼,恐怕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甚至有一种说法,他的观点就叫做货币主义,他的流派就叫做货币学派。

他一直以来认为货币是中性的,会实实在在影响真实经济。早年他以一部抽象的《价格理论》分析了货币的作用过程,晚年则又复归到历史,写了一本《货币的祸害》从货币的起源谈到货币政策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他晚年那本总结货币历史的小册子引用了十余种中国人编的各类介绍近代货币制度的文献。作为最后一个坚守银本位的国家,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进行了多次不甚成功的货币改革,在如此广泛的地域,如此众多的人口中产生极大影响,给其他国家留下一些惨痛的教训。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反映出弗里德曼对中国的感情。与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相比,弗里德曼真正关心中国实际改革状况的。

中国问题太复杂,太多西方理论工具一到中国就失灵。所以当年哈耶克访问台湾,被问及他那套理论的普适性时,他谨慎地表示对亚洲文化所知不多,担心自己的理论被简单照搬到东方的后果。另一位诺奖得主布坎南干脆就表示,他的理论思考和实际经验完全是出自西方人的逻辑,所以无法对中国的改革提出更多建议。

而弗里德曼则不然。他80年代就来过中国,一直努力通过实践调查和真实历史数据来了解中国。他早年指导过的两个中国学生,后来均成了新中国金融货币理论的权威。一位是陈彪如,一位是陈观烈,堪称中国经济学界的“二陈”,与史学界二陈交相辉映。陈彪如先生翻译过一系列经济学



◎ 梁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专栏作者

完备时的疯狂实验。

汤良礼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货币系统》则是弗里德曼另一本重要参考书。汤良礼早年留学英伦,通晓多国语言,曾任国民党的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本是一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可惜后来因逆汪伪政权,抗战胜利以后就极少为人所提及,但他的著作在海外外大有影响。

除了张嘉璈和汤良礼以外,还有两位重要的学者杨联升和叶孔嘉分别从历史和统计角度谈中国金融,构成理解中国金融制度和金融史的另两个重要维度。杨联升是哈佛资深汉学教授,留美之前就师从陈寅恪教授,有着深厚的史学功底。多年来,他游走于经济史、制度史、社会史等多种专门学科之间,擅长从特别角度发掘特别的问题。他1952年出版的《中国的货币与信用》还是一本规范的经济史著作,材料翔实,清晰勾勒出中国古代的货币发展历史。

叶孔嘉则是60年代以后重要的中国金融史家,多年来任职于兰德公司。他在196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里,运用统计的方法描述了中国大陆在1931-1936和1951-1957这两段时间的资本形成。在这两段时间里,中国金融都经历了大转折,所以叶孔嘉的分析不仅得出诸多可靠的结论,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分析转轨时期中国金融问题的一般范式。

弗里德曼不懂中文,但他通过张嘉璈、汤良礼、杨联升、叶孔嘉的著作渐渐拼成一幅中国近代金融体制完整的图景。弗里德曼年逾90,写下那些研究文字时已七八十岁了。一个外国老人如此认真学习和分析中国货币改革失败的教训,他的忠告自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倾听的。

此志不遂,张氏转投学术,根据多年实际经验写出了《通货膨胀的曲线》。也正是这本书帮助弗里德曼清晰地还原出中国金融制度不

■ 彼岸

通用Hummer汽车能重塑男子气?



◎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在美国,可以在公开场合和媒体随意谴责有权势的政客(包括总统),但言论也并非是完全自由的,有一些领域是不能随便乱讲话的,比如不能说犹太人的坏话。最近好莱坞明星梅尔·杰布森在酒后驾车被拘时说犹太人给世界带来战争,遭到了美国媒体的围剿,尽管杰布森多次认错,并表示道歉和悔改,但有电影业专家称,杰布森的演艺事业将就此告终。

对少数民族(主要是黑人)也是不能乱说话的。前一阵子,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有一个文体技能比赛,比赛的评委有两个白人男性、一位黑人女性,比赛中有一组黑人少女表演歌唱节目,水平欠佳,可两个白人评委却没有明指她们不够水准,那位黑人评委却毫不客气告诉那组黑人少女根本不可能晋级。显而易见的是,那两位白人评委不愿意给人落下轻视黑人选手的嫌疑,倒是黑人评委没有顾虑。

尽管当今美国的媒体、公司,以及名人们等都非常注意在这些“禁区”管住嘴巴,但防不胜防,时不时总有闯入“禁区”者。最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又犯了戒,在为其越野车Hummer(美式军用吉普)做的一则电视广告中向观众展示了这样的场景:两个成年男人在超级市场同时通过收银,一位买了豆腐、绿色蔬菜、减肥牛奶;另一位则买了牛排、土豆片、披萨饼。在出了超级市场后,那位买豆腐的男人冲到了一家通用汽车的展厅,当场交钱买下一台Hummer,在豆腐男人开出的那辆Hummer时,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行大字“Restore Your Manhood”(重塑你的男子气)。该广告播出不久,立即遭到一些抗议,很快通用汽车广告公司的“Restore Your Manhood”(重塑你的男子气)改成了“Restore the Balance”(重新获得平衡)。

通用汽车Hummer广告的原意,无非想要表达线条有力、马刀巨大的Hummer车能给驾车带来阳刚之气,只改了那么几个字的修改版本却有差出十万八千里的意境,平衡是什么意思?是浑与素的平衡?还是豆腐与什么平衡? Hummer的意图还在“平衡”二字里面,但需要观众有一个跨度极大的想象空间。更何况,“平衡”与“男子气”相比,更失去了通用汽车对失去阳刚之气的一个判断,即豆腐、减肥牛奶等可能磨损男人阳刚之气,而阳刚有力的Hummer却能够替豆腐男人找回那失去的男子气。

通用汽车这则Hummer广告冒犯了美国女权主义、同性恋者、素食者、环保主义者、动物保护协会(PETA),在当选中,女权主义、同性恋者是比较大的禁区,通用汽车定是招惹不起的,还有素食者们要提问,难道吃几块牛肉就更有阳刚之气?对于耗油特大的Hummer,环保主义者一直视为“敌人”,曾经有极端环保主义者在Hummer的车行烧毁了一些Hummer新车,PETA则反对猎杀任何动物,曾将炸鸡比作二战中焚烧犹太受害者。因此,更准确地讲,这则Hummer广告不仅是冒犯,而且是一种挑战。可问题是,一台Hummer就能够拯救美国社会失去的男子气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仅是Hummer解决了男子气的问题(比如大学里只有45%的男生,更多的高中生中毕不了业),而且通用汽车也没有多大的勇气,因为也就是坚持了三个星期,便以“平衡”代替了“男子气”。

也许通用汽车的Hummer并非是要增加阳刚之气的良药,其广告的目的可能是,要以Hummer敌对者的愤怒去增加Hummer顾客群的忠诚,热爱Hummer的美国人会觉得Hummer提倡阳刚之气的广告受到刁难,更说明Hummer有足够的男子气,这应该是能够解释通用汽车为何推出这则“重塑你的男子气”广告,因为没有人能相信Hummer所表达的男子气能改变一位环保主义者希望人人都开小型车的理念。此外,动物保护协会不会去理会男子气多少的问题,不管从那个角度讲,他们都会拥护吃豆腐、不吃肉的男人。

我同意美国有失去男子气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那么多NBA的大男人要戴上一对精致的耳环?但我不相信,驾驶耗油巨大的Hummer就能重塑男子气,在一定层面上,反而Hummer也是美国社会失去男子气的原因之一。那天,从我的车边驶过去一辆Hummer,开车的却是一个叼着烟卷的美女。